2017年3月2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杨丽萍
版式策划:杨慧军 制图:安宁
内蒙古日报

■百科

宇航员或可“人工冬眠”

在人类前往其他行星之前有个问题需要解答:宇航员如何度过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星际远航时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帮助太空工程企业公司进行相关研究筹资,该公司旨在通过一些办法让宇航员进入人工冬眠。

要启动这个人工冬眠过程,这家公司将把人的体核温度降至32摄氏度,然后用镇静剂阻止人体对寒冷做出自然防御——发抖。

在患者受到心脏停搏等外伤、因血流量不足而需要额外时间进行康复时,医院就会采用这种被称为“低体温治疗”或“靶向体温管理”的做法。体温降低可使患者陷入无意识般的状态,作为一种神经保护来减缓新陈代谢的速度和降低缺血性损伤的风险。

不过,患者的这种状态通常只能保持几天时间,迄今为止试验过的最长时间是在中国完成的一项14天的研究,结果显示对患者没有任何持久的副作用。

太空工程企业公司总裁布拉德福德认为,太空工程企业公司可以改进当前技术。理想状态下,乘员交错进行每次持续2周的沉睡。经过2周的冬眠后,乘员将苏醒,恢复几天,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冬眠。 (据《参考消息》)

■知道分子

动物真的会自杀

2016年5月,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海洋世界公园,一头虎鲸跃出水池,裸露在沙滩上足足10分钟,其间,它极力磨牙,并用力乱咬。人们纷纷猜测,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的缘故——被圈养的虎鲸无法适应海洋馆的人造环境,患上了抑郁症,因而试图自杀。

精神病学家威廉·劳德·林赛认为,动物患有“自杀忧郁症”,和人一样也会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医学史家邓肯·威尔逊认为:“动物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和意图,其中就包括自杀。”这些说法引起了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注意,如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该组织为此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答案。

有学者认为,由于动物长时间被安置在人工环境中,可能引发一些不正常的行为,这也许反映了一种“动物试图逃脱监禁”的本能行为。还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些被圈养的动物之所以会追随主人而死,正是因为它们不懂得思考,习惯了主人喂给的食物,便不愿再接受其他人的施舍。总之,某些外部条件改变造成的压力,的确可以改变动物的行为,甚至威胁到它们的生命。 (据《今晚报》)

眼睛颜色的奥秘

我们眼睛的颜色是由虹膜上黑色素的量决定的,虹膜是我们瞳孔周围的一圈“有色环”,而黑色素是一种化学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肤色和发色。看似有着不同颜色的眼睛,其实在虹膜下都是自然棕色。

黑色素其实属于深棕色,当黑色素浓度高时,看起来就会是黑色的。黑色浓度不同,吸收光线的能力也不同。如果反映在眼睛上,当黑色素浓度很高时,我们的虹膜就会呈现深褐色;黑色素浓度很低时,只有少量的光会被吸收,大部分的光被反射走,就会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而当黑色素的浓度介于二者之间时,眼睛会呈现出暗绿色或淡褐色等不同颜色。

此前,人们认为眼睛的颜色是一种简单的遗传特征,可以根据父母眼睛的颜色,甚至爷爷奶奶眼睛的颜色来预测孩子眼睛的颜色。不过,遗传学家指出,有多达16个不同基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眼睛的颜色。虹膜的解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眼睛的颜色。所以,即使父母双方都是蓝眼睛,也不能保证孩子的眼睛是蓝颜色。

虹膜中的黑色素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伤害。由于蓝眼睛黑色素的含量低于其他颜色的眼睛,更容易受到紫外线或蓝光的伤害。 (据《北京晨报》)

■时政观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海归潮**

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回国迟了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是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但在2015年3月,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国内的机会太多。国内互联网的规模超出我的想象——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他们都以为自己不会回头。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不再“毅然”回国

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在2014年,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过去,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时,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当李才伟在2013年回到中国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绝对是大势所趋。”

王欢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过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

1987年夏季,赵海平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长城时,邓小平刚刚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但现在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到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不做旁观者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据《中国青年报》)

■走笔

“虚”度人生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虚”的成分存在。这里的虚,不单指谦虚,而主要是一种脱离了礼貌、类似于虚伪的东西。

许多人都赴过宴会或进过酒场吧。细细想来,无论是家宴还是公宴,在入席之前必有一个你推我让的环节。谁坐在主宾的位置,谁坐在次席,是主要的“矛盾点”。尽管有时在心里认为主宾位置非自己莫属,也会与人互相谦让一番之后,才会“勉为其难”地坐过去。

也有例外,我就经历过这样一个饭局。当众人一致恳求某老板上座时,他话头一转,把位置让给另一位和他一起来的人。那人也“不经让”,没过几个回合竟然一屁股坐了下去。某老板心中不快,只能屈居次席。席间,他装了一脸笑容说:“这就对了嘛!”我和那位老板接触过数次,却从未见他喝下过那么多的酒。散席之后,我奉命开车送其回家,只听得他一路咒骂……

不仅是官场、商场,普通老百姓交往也是要“虚”的。那日,我随母亲出去买菜,走到路口就碰见了多日不见的熟人。说了几句后,母亲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说:“我家就在那,走,到家里去坐坐。”只见对方脸上堆满了笑容:“不了,我还有事,有空再去。”见那人走远后,我对母亲说:“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明明知道人家不会去的,还说这些干什么!”母亲平淡地回了一句:“总比不让强。”

嘿!我就不认这个理儿,我认为,与其虚让还不如实在点好。走到单元门口,恰好遇见了同事老刘,他说自己的表弟也在这个小区,没事过来看看。我想到刚才的一幕,便对老刘说:“时间不早了,该做饭了,那我先上去了。”说完这句话,我便拉着母亲转身上楼。时隔不久,在与单位同事闲聊的时候,别人对我说:“老刘最近对你的评价可不怎么好啊,说上次就在家门口遇见了,你都没让人家进屋。人家老刘还说,就算你让了,谁还真去啊?”我一时语塞。

仔细想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虚”,着实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如果把它当作“礼貌”来讲,未免牵强,当作“虚伪”来说,又未免过分。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和人进行交往,就必须得“虚”。“虚”得恰当,“虚”得自然,你才会左右逢源,不被排斥;当然,如果“虚”得过分,“虚”得造作,别人就会认为你油头滑脑,势必对你敬而远之。 (据《讽刺与幽默》)

跑不动时咬牙坚持一会儿

你跑了三四公里,感到极其疲劳、心率剧增,感觉很难支撑下去,但当你跑到5公里,一下感到没那么难受了,这在生理学中称为“第二次呼吸”。这指的是“极点”现象。

极点一般是剧烈运动的开始阶段,运动系统开始大量耗能,但是由植物性神经控制的内脏器官的活动不能满足躯体神经系统控制的运动系统的需要,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动作迟缓、心率剧增等现象,我们称之为“极点”。

当“极点”出现后的一定时间,由植物性神经系统控制的内脏器官的活动渐渐与由躯体神经系统支配的运动系统的活动相适应,“极点”症状就会明显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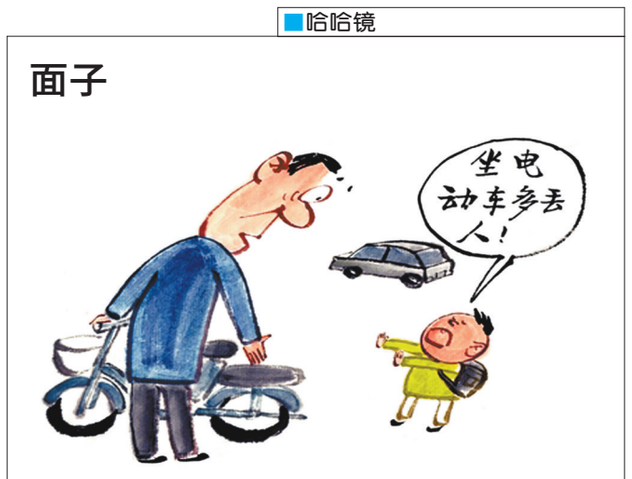
所以,运动的时候请不要轻易放弃,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有效地克服“极点”所带来的不适感。

如何降低“极点”反应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调节方法:如在运动开始前做一些准备活动,特别是针对循环系统的,能更快地动员惰性器官,使机体达到新的平衡;在运动开始时速度不要太快;当达到“极点”时,适当降低速度,但不要停,克服“极点”后再恢复正常速度;掌握好呼吸节奏以及增大呼吸深度等。此外,运动前5分钟适量补糖,在空气质量较好、氧含量较高的地方运动,能有效降低“极点”反应。

(据《科学生活》)

■哈哈镜

面子



(据《讽刺与幽默》)

■地球村

开学第一课,国外学生学点儿啥?

这几日,中小学生们又迎来了新的学期。为了帮助学生们尽快从春节的“放假模式”切换到“开学模式”,学校往往会精心准备“开学第一课”,用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形式为新学期的校园生活定下积极而愉快的基调。

国外同样十分重视“开学第一课”,内容虽各有侧重,但核心都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些教育和启发。“开学第一课”,各国究竟学点啥?

法国:“公民教育”与社会现实接轨

在法国,学校方一般不会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孩子们只需到校半天,气氛相对轻松。但家长却很重视开学日,一些大型企业还会专门给有孩子的家长放假1天,方便家长带孩子去购买文具。不过,面向全校学生的“开学第一课”却毫不含糊,每位学生都要学习“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

2013年初,法国前教育部长文森特·佩隆发布了该项课程改革计划。从那年起,“道德与公民教育”课取代了传统的“公民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出现在孩子们的课表上。为什么要在新学期伊始学习这门课?教育界人士表示,这个时代的学生必须要摒弃与社会生活脱节的“读死书”模式,真正认识、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

因此,翻开“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的课本便会发现,2015年1月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也作为“保护言论自由”的案例,被纳入到课本中。以往,法国传统公民教育课的内容往往停留在理论知识教学上,而“开学第一课”上仅仅讲解识记政治、法律常识,对于学生们而言较为枯燥。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法国经历了数月的大讨论,“与社会现实、与时事接轨”的课程改革宗旨呼之欲出。大刀阔斧改革之后,课程不再让学生产生“距离感”,而是对许多现实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

同时,在“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宗旨下,法国对“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的组织形式也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贝尔卡桑说:“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课程的重头戏放在了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交流上面,甚至还可鼓励角色扮演来深入了解。”他还建议,“第一课”不妨加入舞蹈、戏剧、学生委员会、辩论、模拟法庭等活动。

日本:防灾演习,安全教育放首位

日本的新学期开学日期也是9月1日。小学生们的上课节奏也和中国一样,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在日本,一年级新生的第一课很受重视,学校会举行隆重的典礼,祝贺孩子们成为一年级的学生。校长会面向全体学生和家长致辞,一方面倡导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一方面提醒家长要注重教育方法,耐心倾听、主动关心孩子。

9月1日,这天不仅是开学日,同时也是日本的“防灾日”,因此,“开学第一课”实则就是一次安全演习操练。因此,学生们在开学当天要带着自己的暑假作业,按地区集合后,整队走向学校参加集体的安全教育。

在学校组织的演习会重点关注学生们的地震模拟逃生能力,对人员撤离的顺序都有详细的安排。其中,学生最不能遗忘的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多功能防灾头巾,头巾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住址、血型、出生日期等信息。所谓的防灾头巾就相当于大人们用的安全帽,它不仅能够防止地震发生时下落的物体砸到孩子的头部,而且还具备防火功能。进入幼儿园阶段后,孩子们就一直在学习演练防灾头巾的使用。

因为日本的学生一般自己上下学,学校还会发给每位学生一本交通安全指导小手册,指导学生们安全过马路、遇到紧急事件如何处理。手册上不乏一些实际应对的细节,比如如何拒绝陌生人的邀请,被硬拉扯时要大声喊叫,要拉响书包上的警报器等手段。 (据《解放日报》)

■闲话

一代史家蔡东藩

蔡东藩著作强调“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可有趣的是,他自己的历史却疑点甚多,至今难断真伪。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驻西安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所谓“整个中国历史演义”,即蔡东藩著《历朝通俗演义》,该书上迄两汉,下至民国,共计651万余字(不包括许廑父为《民国通俗演义》后续的40回字数),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部历史小说,蔡东藩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毛泽东后来将这套《历朝通俗演义》从陕北带到北京,并置《清史通俗演义》于枕边。

在目前各版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基本没有提及蔡东藩,但顾颉刚先生曾说:“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

离奇的举人考试

蔡东藩生于1877年,本名郕(Chéng),字椿寿,号东藩。

蔡家世居浙江绍兴,太平天国时迁至浙江萧山。蔡父是丝行店员,工资微薄,教子甚严,蔡东藩二哥10岁已博览群书,被称为“神童”,蔡东藩幼时随二哥读书。11岁时,大哥二哥患病去世,蔡东藩被送至富家伴读。

14岁时,蔡东藩与其二姑丈田沛鋆一起去考秀才,据蔡东藩的长孙蔡福源记:“每进考场,人多拥挤,二姑丈双手挽着两只考篮,腰中系一根布带,在前开路,叫祖父拉住二姑丈的腰带。”最终二人都考上秀才,蔡东藩的成绩在前。

15岁时,蔡东藩在杭州一满人家执教,不久父母相继去世,为安葬老人,蔡家欠下二姑母家巨款。据蔡福源说,为还债,蔡东藩不得不于1893年、1896年两次替别人代考举人。然而,据学者考证,1893年、1896年并无乡试。

据蔡东藩大事年表,蔡东藩又于1899年、1902年参加了两次举人考试,均落榜。

第一次据说蔡东藩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赴考,学生家长派人送蒸鸡等至考场犒劳,蔡推托之间,鸡汤将试卷沾湿,加上考试时间将尽,来不及誊清,所以落榜。可清代科场严禁外人进入,怎么可能将鸡汤送进去呢?

第二次则据说是“天气酷热,大汗淋漓,试卷汗渍斑斑”,再度因试卷污损而落榜,亦离奇。

编书匠照样惹祸

1909年,33岁的蔡东藩参加了省级优贡考试(没考上举人但成绩优秀的秀才可进入国子监读书,学成后经考试选拔,可以授官),名列前茅。第二年,蔡东藩进京参加优贡朝考,名列第一,还觐见了宣统皇帝。

对于这次觐见,蔡东藩后来曾说:“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己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1911年,蔡东藩被分配到福建任候补知县,因无钱行贿门人,竟被拒之门外,无法见到上司,好容易见到了,上司也没给他安排工作。

蔡东藩深感挫折,便称病回家。

这年秋天,蔡东藩的同乡好友、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辑邵希雍拉他去编书,蔡刚开始没答应,在邵反复邀请下,参与了《中等新论说文范》的编辑,并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进行修订。

没想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惹了大祸,因书中《尚武论》《贵土货贱洋货议》《论商战》等文涉及日本,特别是一篇《民气说》,称:“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已而……”日方强烈抗议,袁世凯下令查禁此书。

读书的目的

在创作《历朝通俗演义》之前,蔡东藩就曾在杭州、绍兴等地教书,蔡东藩讲课激情四溢,常对学生说“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读懂为人的道理,不要去巴结权势,人应该堂堂正正地活着”。

虽然在《历代通俗演义》中,蔡东藩对女性颇有恶评,但他却是临浦镇上第一个收女弟子的先生,还编过《女子初学新论说范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东藩有过“实业救国”的念头,办了一个毛巾厂,名为“坤元”,手工织造,以抵制日货,可萧山被日军占领后,蔡东藩的工厂遭土匪抢劫。

因常年写作,蔡东藩患上严重的胃病,又不愿在“敌人的刺刀下求活”,躲到山区,因曾得到岳父黄镐京真传,故悬壶济世。1944年深秋,蔡身体不适,却坚持出诊,回家后患上“三日疟”,对家人说:“我已灯尽油干,非药石所能治愈了”。

1945年正月,蔡东藩诵念着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溘然长逝,终年69岁。

(据《北京晚报》)